

談笑戲諺四十秋

戴仲玉兄與我

(本文插圖刊第49頁)

●嚴靈峯(國民大會代表·國立臺灣大學教授)

鐵三角中調和高手

民國三十二年年初，我在福州市擔任中國茶業公司福建省辦事處主任，因為囤積在三都澳的三十幾萬箱茶葉，由於閩江口被日軍封鎖，無法出口；正擬運用閩海張逸舟、鄭德明兩股僞軍，設法向上海推銷。在接洽進行中，突然接到陪都重慶打來急電，要我立即離開，前往重慶，接任國家總動員會議經濟檢察組主任遺缺。我當時有些迷惘，不知道這個機構擔負什麼任務？即時去電重慶友人查詢究竟？據來函告知：「這個職務非常艱鉅而且人事複雜；但委座(蔣委員長中正)已下了條子，恐怕推辭不得！」

因此，我祇好攜眷束裝就道，直趨重慶。

國家總動員會議於民國三十一年五月一日成立，由蔣委員長中正先生兼任主席，總動員會議內設軍事、人力、財力、精神動員、檢察五組及物資處。首任秘書長為賀耀組，相繼為沈鴻烈、張厲生和端木愷；副秘書長則是何浩若、端木愷和夏晉熊。原任檢察組主任朱惠清，兼四川省經濟檢察總隊長，下轄重慶、成都、自貢三個大隊。戴仲玉兄當時擔任秘書工作。辦公地址在上清

寺，租用聚興誠銀行的房舍。

總動員會議編制人員四百餘人，檢察組內動員主任賀衷寒，我的留俄同學；財力組主任劉攻芸，我的同鄉朋友；物資處副處長張延哲，原名文理，民國二十一年前後，在上海他和江公懷等搞「生產黨」時我早已和他認識。除此之外，可謂「舉目無親」。

我到差的第一天，在組內會見的第一個人，就是戴仲玉兄。他告訴我：「一切移接手續早已準備妥當，希望為他調個職位。」我對他說：「我做事一向不用私人，你是不屬那一單位的人員，並且是我的同鄉；請你繼續幫忙，不必客氣，俾能駕輕就熟，共赴事功。」這樣，我們便成了同事和朋友，一直到總動員會議結束為止。

檢察組的人事結構，非常特殊；大部由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、中央黨部調查局、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別動隊三個機構調用的。這三個機構的主管是：戴笠、徐恩曾和康澤三位先生；在全民抗戰，鞏固後方，堪稱「鐵三角」。他們的手下雖非三頭六臂，最低限度也可說不少是各路的英雄好漢。在人事的管理和紀律的維護上是一種最

棘手的事。組內設三個副主任，最初王撫洲，代表軍統局；他離職後，我推薦該局第二處處長王新衡兼任；王醒魂代表中調局，調職後，由熊東泉接替；涂公遂則一直代表三民主義青年團。

檢察組的職責非常艱鉅和嚴重，為安定戰時後方經濟，負責檢舉奸商囤積居奇、擾亂市場、管制物價。另外，蔣委員長向下一手令，應負責檢舉政府的高級官吏的貪污不法；不問其職位多高。

我到任時秘書長是沈鴻烈，民國三十二年八月，秘書長由行政院秘書長張厲生兼任，「組」改為「處」；工作範圍擴大，檢察隊由三個大隊，擴編為重慶、成都、自貢、宜賓、萬縣五個大隊，又於民國三十三年十月在陝西西安成立第七大隊。第六大隊原擬設在衡陽，以後沒有實現。大隊隊長、隊附以及其他人員皆採交叉分配；如軍統局任隊長，則隊附應由中統局或三青团分別調派，反之亦然。

總動員會議經濟檢查處內部重要問題，在於人事的安排、紀律的處理和紛歧意見的協調，我必須站在「超然的」立場擺平各方關係；但亦未便向各單位人員直接硬性指示，也不便對各副主任

中 過份遷就；因此，戴仲玉便成另一只活棋。他雖專任文書工作，但在調和各單位意見時，却成了重要角色。他週旋於各副主任及各大隊長之間，溝通歧見，聯絡感情，態度穩重，手腕圓通；使三個單位人員精誠團結，合作無間，成就極大。

福州市上互相照應

關於紀律方面，在我未到任前，重慶大隊由三青團調用的一位督察，因收受商人貳萬元賄款，結果奉委員長命令執行槍決。在我任內以至結束，從未再度發生。在辦案方面查封大量違法貨品，乃至當時紅極一時的徐堪主持的糧食部在江津農民銀行倉庫，囤存三十萬擔糧食米；陝西中國銀行倉庫，囤藏大量戰時物資，均被查封，毫不瞻徇寬貸；簡直是「太歲頭上動土」。戴仲玉兄在組內服務忠勤，成績卓著，使我至今尚不能忘懷。

因此，在民國三十二年十二月，開始各省銀行倉棧總檢查時，特地派戴仲玉兄回福建，駐永安、南平督導福建省保安處進行檢查工作，查封了四十件囤積居奇案子，順利達成任務。

檢察隊可以直接查封違法倉庫，扣押物資，逮捕嫌犯，逕送總動員會議另設的軍法執行總監部訊辦。權力膨脹，奸宄聞風懾服。一切皆依賴各隊員工作勤奮，紀律嚴明，操守廉潔；乃有恃無恐。所以，到了三十四年，總動員會議結束之時，行政院還對檢察處工作傳令嘉獎，通告全國。從此，全部工作人員勞燕分飛，各奔前程。

抗戰勝利，日本投降後，民國三十五年，我

出任福州市市長，戴仲玉兄膺任三民主義青年團福建支團幹事長。雖無直接工作關係，但亦彼此互相照應，情感益篤。

任閩主席長達卅年

民國三十八年，中共全面叛亂，軍事失利，大陸領土全部為中共所控制，政府播遷來臺，當年總動員會議經濟檢察處重要人員亦先後抵達臺北。此時，王撫洲和戴仲玉兄皆已當選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，王新衡、熊東臬、涂公遜都當選了立法委員，均為中央民意代表。足證當年檢察處的高級幹部多是才能卓越，在地方上具有高度聲望；堪稱：國之貞幹！

戴仲玉兄以後能主持福建三民主義青年團支部，並出任福建省主席達三十年之久，可說是建國七十餘年來所罕見——縱然因金馬戰地屬軍事管制地區，使他無法充分推行省政，抒展個人抱負；但對戮力於省政設計研究督導工作不餘遺力，亦可說是一種奇蹟，其事功終不可沒。

民國四十二年冬，我往日本東京，由湯恩伯將軍介紹日本漢學家安岡正篤，透過他的關係，從事國民外交並探究散落在海外的重要文獻；居留四年又六個月。四十七年又赴香港在珠海書院任教，同時創辦「中國評論」週刊，達五年又兩個月之久。在此十年之中，少通音問。返臺以後，常多聚首，在國民大會的各種會議上，同鄉友好婚喪的宴會以及一般餐敘，乃至咖啡廳、小吃店經常碰面，談笑戲謔，輕鬆愉快。四十餘年歲月，始終保持真摯的友誼。

元配謝世情緒低落

他自元配段秀貞女士謝世以後，又患輕微中風，情緒低落，生活感到寂寞。遂於七十年元月三日，在臺北市新生南路天主教堂與林美良女士結婚。當時祇有極少數親友參加，也邀我們夫婦觀禮。婚禮簡單而嚴肅，在神父的主持下，我喜歡聽到兩人同時說出：「願意」的聲音，祝他晚年有更幸福的生活。

他年來體格在表面上看來十分健康，食量亦佳；不過每日飯後要服：糖尿、心臟、血壓、通便四種成藥。在每次的宴會中，一定攜帶林女士陪伴前往，為他配藥、檢菜，十分週到；但他的心身不太寧靜，我早已為他憂慮擔心！

民國七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中午，他們的友人高小姐請他夫婦在長安西路馬來亞餐廳吃飯，一定要我作陪；我當場表示定下星期三由我作東，在敦化北路蓮園回請；不巧直到他的逝世，竟沒有實現。真是：「一飲一啄莫非前定。」

七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以後他進進出出三軍總醫院，五月八日他還約我到他家吃中飯；次日又進醫院，我於五月十二日前往探視，他正在睡眠，未能看到；十四日他遷到加護病房，我夫婦同往探問，他已不能言語，醫生叮囑不許會客，廢然而返。二十一日上午，接到何宜武兄電告：仲玉兄已於當日早晨，與世長辭。我從此和他生死永訣，心中何等沉痛。為追懷戴仲玉兄與我四十餘年共事，深長友誼；追思往事，撰此短文，用表懷念之忱！